



有些隐喻为什么不可能？

——物性形容词认知语义拓展的限制与动因

唐树华◎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740096）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12YS124）

本书出版获得上海对外贸易大学085工程建设项目资助

有些隐喻为什么不可能？

——物性形容词认知语义拓展的限制与动因

唐树华◎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些隐喻为什么不可能?——物性形容词认知语义拓展的限制与动因/
唐树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309-09797-9

I. 有… II. 唐… III. 英语-形容词-隐喻-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14.2②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616 号

有些隐喻为什么不可能?——物性形容词认知语义拓展的限制与动因
唐树华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74 千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797-9/H·2116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概念隐喻研究最大的贡献和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将隐喻从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现象上升为一种概念层面的思维现象,认为隐喻是人类思维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化过程,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等)。

过去 30 年的概念隐喻研究在“概括性承诺”的框架下,致力于从音乐、建筑、语言等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寻求汇流证据*,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来源为语言研究领域。近来招致了诸多批评:概念隐喻不可证伪;相关语言证据多为孤立生造;围绕概念寻找语言例证的研究指向使语言现象规律性成为核心,不规则性和差异性遭到忽视等(Gibbs 2008; Kovecses 2008; 刘宇红 2006)。

语言现象的系统理据性与不可预测性,人类体验的共通性和以体验为基础进行抽象拓展产生的差异性,是隐喻研究的潜在矛盾。随认知语言学基于使用语言观的深入和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推广,这些矛盾日渐突出。如语料库调查发现从源域到目标域映射的过程中,地位相似的成员并非都能在目标域中被词汇化;语言搭配也呈现相对固定性特征,通过内省方式貌似成立的搭配在实际语言使用中根本不存在或低频存在等(Cienki 2005; Deignan 2005; Semino 等 2004; Semino 2005)。

针对这些问题,国际认知隐喻学界近来呈现“新语言本体”的趋势,即在新理论框架下,结合语言系统本身的构式、构形、语篇特征展开研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Sullivan(2007)利用构式语法路径对“形 + 名”短语(如 spiritual wealth)隐喻性的调查;Zanotto 等

* Mark Johnson 2009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座。

(2008)对自然语篇中的隐喻进行的调查;Cameron(2007)通过调查和协调概念隐喻理论假设的隐喻和实际语篇中隐喻之间的矛盾,提出的动态隐喻理论等。如 Zanotto 等(2008:1)所言:“学者深入挖掘了隐喻的认知理据和涉身特征,但却将语言形式置于幕后。是时候将隐喻看作是语言和语篇的现象,而非思维现象了。”

在我国,张韧(2007)注意到了转喻在语言结构上的体现受到的规约性限制。他认为这些限制本身可以理解为广义构式,而转喻引申往往在句法组合或特定构式环境下发生。在隐喻研究方面,唐树华(2011)发现汉英形容词的隐喻拓展与各自的构形和构式特征密切相关。但总体来讲,我国相关研究基本仍以概念为本体,围绕概念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较为雷同:汉英隐喻相似性基于体验相通性,差异性源于文化差异性(如项成东,王茂 2009;覃修桂 2009 等)。

撇开语言本体,完全从概念和认知出发来讨论语言现象,忽略语言本身的社会性和规约性,不利于隐喻本质的理解(王德春 2009)。本书顺应隐喻研究的“新语言转向”(第二章),分析语言表达形成的双重管制——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和概念隐喻理论的互补与矛盾关系(第三章),结合谓语句构式和词类构形对汉英形容词隐喻拓展进行对比(第四章、第五章),以期能够突破认知隐喻研究的瓶颈,使隐喻概念及隐喻表达的不可预测性、理论事实矛盾性、跨文化差异性得到呈现和梳理,并从语言和概念的双重路径进行解释,同时也能够为汉英形容词类特征的理解提供新视角(第六章、第七章),最后也试图对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第八章)。

唐树华

2013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引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从语言发展的双重管制谈起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 ——汉英物性形容词的选取	3
第三节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与语料库方法的选择	9
小结	11
第二章 从有些隐喻为什么可能开始	12
引论	12
第一节 概念隐喻的本质	13
第二节 概念隐喻与语言研究	17
第三节 概念隐喻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28
小结	33
第三章 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与规约性	34
引论	34
第一节 概念依存性与形容词谓语句的认知图式	34
第二节 基于使用的语言规约性	41
第三节 语言表达形成的双重管制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对理据性研究的补充	45
第四节 语言的理据性与规约性	47
小结	48

第四章 汉英形容词谓语句主体异同	50
引论	50
第一节 体验域主体分布	
——汉语单音谓语句与英语谓语句	51
第二节 汉语体验域双音谓语句主体分布特征	60
第三节 抽象域主体概念	63
小结	88
第五章 英语物性形容词构形和谓语句构式	89
引论	89
第一节 英语与汉语形容词的情状范畴对比	90
第二节 英语形容词的性质:静态与状态变化	94
第三节 英语形容词谓语句的总体构式特征	98
第四节 英语形容词谓语句构式分布	100
小结	107
第六章 汉语谓语句形容词性质及其句法表现	108
引论	108
第一节 汉语形容词谓语句特征	108
第二节 汉语谓语句形容词的情状范畴	111
第三节 汉语形容词构形	
——单音与双音	112
第四节 汉语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标记性	113
第五节 单音形容词谓语句构式	117
第六节 汉语双音形容词谓语句构式特征	132
小结	133
第七章 汉英谓语句物性形容词隐喻拓展异同成因	135
引论	135
第一节 体验基础与认知图式	139

第二节	文化脚本	147
第三节	构式	150
第四节	汉英形容词及物性构式差异及其 对隐喻拓展的影响	157
第五节	形容词构形	164
第六节	汉英抽象拓展相似性与形容词内部一致性	169
小结		173
第八章	有些隐喻为什么不可能?	174
引论		174
第一节	从有些隐喻为什么可能到有些隐喻 为什么不可能	175
第二节	隐喻表达形成的概念理据性与基于 使用的语言规约性	177
第三节	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多维性与互动性	182
小结		183
参考文献		185

第一章 绪 论

引 论

语言从哪里来?不同语言的共性何在?它们的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都是语言研究的根本问题。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和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从两个不同的路径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颇具深意的启示。本章将论述本书的研究缘起,具体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目的。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从语言发展的双重管制谈起

自 Lakoff 和 Johnson(1980)以来,探究语言现象的概念理据性一直是隐喻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束定芳、黄洁(2008)分析了双音并列复合词的思维和概念理据;聂亚宁(2009)探讨了英语动词时态隐喻映射的理据;杨小虎(2009)阐述了词类认知结构中包含的概念隐喻理据;孙毅等(2012)考察了汉语移就辞格的生成理据。简要总结这些概念隐喻研究,就是致力于回答:隐喻概念如何使隐喻表达成为可能?

但近些年来,概念理据性相关研究遭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1. 概念理据性对同一语言如英语中的 a warm smile 和 a big problem 的不同生成过程缺乏预测性和解释力;2. 概念隐喻理论不可证伪,语料和证据孤立生造;3. 自上而下围绕概念隐喻寻找语言现象的研究指向使语言现象的规律性而非不规律性成为重点等(刘宇红

2006; Gibbs 2008; Kovecses 2008 等)。

相关研究的共同特征在于从语言形式的概念理据入手分析和解决问题,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相似:即同一语言成组词之间概念映射的不同源于认知图式的差异,跨语言对应词概念映射的不同在于文化脚本的差异。但仅从概念的角度出发,用文化和认知图式基础差异来解释隐喻表达理据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并存、体验共通性和拓展差异性的共存尚未给出问题的全部答案。例如有研究发现基于具体语言使用的语言系统抽象化和规约化过程,同样对各类语言表达(含隐喻表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语言现象的系统理据性与其不规律性和不可预测性,人类体验的共通性和以体验为基础进行抽象拓展产生的差异性一直都是隐喻研究领域两对潜在的主要矛盾。很多相关研究都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如 Gibbs 和 Steen (1999), Dirven 等 (2003) 等将体验域词汇的隐喻拓展差异与不同的文化模式或文化脚本联系起来;Goddard 和 Wierzbicka (2007) 用自然语义元语言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简称 NSM) 语义分析方法解析了温度域等 6 组物性形容词 (如 sweet, hot, hard 等),提出了普遍语言图式假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同语言同认知域的近义、反义词汇,不同语言同认知域的对等词汇在抽象拓展方向上都具有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指出原型图式差异可能是词汇隐喻拓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并呼吁通过跨语言的对比研究来分析在什么情况下普遍语言图式假设不成立。唐树华等 (2011) 通过语料库检索,对汉英温度域形容词谓语句的主体及其构式进行对比,从语言形式的概念理据走向概念发展的形式理据,发现隐喻表达跨语言差异的形成除了文献涉及的认知图式和文化脚本差异之外,基于使用形成的语言规约系统,尤其是广义构式模式对隐喻生成具有理据性和限制性。

Hines (1999:9) “虽然认同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提出的‘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也是概念系统构建方式’的观点,但对于‘仅仅语言现象’而言,它们的发展不仅依赖概念理据,也依赖语音、语义、句法等语言理据”。这一观点近年开始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而基于语言使用,从语言规约的视角寻求隐喻和转喻等认知机制的生成限制也成

为隐喻研究新的关注焦点。Zanotto 等(2008:1)就指出“学者深入挖掘了隐喻的认知理据和涉身特征,但隐喻的语言形式却被忽略。现在应开始将隐喻看作是社会的、情境的产物,是语言和语篇的现象,而非思维的现象了。”

基于语言使用的隐喻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语料库为基础进行的概念隐喻研究,例如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发现在从源域到目标域映射的过程中,地位相似的成员并非都能取得源域资格,只有部分能够在目标域中被词汇化(Shei 2005);语言搭配呈现出相对固定性特征,在内省前提下貌似成立的搭配在实际语言使用中不存在或以较低的频率存在等(Deignan 2005 等)。二是在基于使用语言观的指导下寻求隐喻表达的规律和限制。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Sweetser 的学生 Sullivan(2007)的博士论文就将研究的核心集中于语法构式在隐喻语言中的作用,认为一些构式槽的词汇表征的是概念隐喻的源域,另有其他构式槽中的词汇则表征的是目标域。我国相关研究目前不多,张韧(2007:21)对转喻在语言结构上的体现受到的规约性限制进行了分析,指出“转喻体现了普遍的认知机制,但局限于概念系统中讨论这一现象有可能会忽略相关的语言限制。”并认为“这些限制本身可以处理为广义的构式,而转喻引申往往在句法组合或特定的构式环境下发生。”

可见,围绕概念隐喻展开的语言发展理据性研究,只能回答问题的一个方面,即解释有些语言表达为什么可能,但它却不能回答语言表达拓展与发展受到的限制,即概念隐喻相关理论虽然能解释拓展的理据,却无法预测拓展的方向,无法解释拓展的受限性。因此,本研究认为:语言的发展是受到双重管制的,这双重管制就是——概念理据性和基于使用形成的规约性。

第二节 研究对象

——汉英物性形容词的选取

形容词词类是跨语言差异最大的一个词类。类型学研究中对于汉语有无形容词这个词类的问题曾一直持有争议(如 Dixon 1982,

2004),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那些针对印欧语系制定的形容词认定标准,在汉语中行不通,或不完全行得通。形容词谓语句中系动词的有无是否可以作为形容词的判断标准问题就是其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例如:

- (1) a. He is hot.
b. 他热。
c. *他是热的。
- (2) a. The soup is hot.
b. 汤烫。
c. 汤是烫的。
- (3) a. The milk turned sour.
b. 牛奶变酸了。
c. 牛奶酸了。
- (4) a. The marriage turned sour.
b. *婚姻(变)酸了。
c. 他们的婚姻由甜转酸。
d. 他们的婚姻出问题了。

从这四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貌似对等的汉英物性形容词“热”和 hot,“酸”和 sour,在作为谓语句的核心时,呈现出诸多差异。首先,对比第(1)和第(2)组例子,可以看出,英语保持了“系动词+形容词”作谓词的一致性,但汉语中“系动词+形容词”的构式却对形容词所能依附的主体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其次,从例(3)和例(4)可以看出,汉英对应形容词“酸”和 sour 在表达具体食物的状态变化时构式和意义用法都是一致的,但在表达抽象意义时,汉语却必须依赖特定的构式如“由甜转酸”来增强其可接受性,甚至要使用动词来表达。

英语形容词谓语句因其“系动词+形容词”的形式一贯性特征,而被称为多义构式,这种构式多义现象使英语对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具有强依赖性。例如 Szabo 和 Brdar(2004)发现形容词谓语句在对其论元与谓词进行组配的过程中,因为需要保持谓语表达的形式不变,因此对转喻机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其他语言,如德语、匈

牙利语,却更多依赖谓语句形式变化进行论元谓词的组配。

汉语与德语等情况相似,倾向于利用不同谓语句形式来体现论元和谓词不同的组配关系,同时具有丰富的双音和多音词汇化方式。并且,汉语句子不一定具备主语和谓语;汉语里即使是具备主语和谓语的句子,也不一定是“NP + VP”的句子,例如:“陈平很勇敢”,“那里风景美极了”(陆俭明 1993:1)。

这些语言系统规约性的不同,势必导致汉英两种语言对转喻、隐喻不同程度的依赖,并产生对隐喻、转喻拓展的不同限制,使一种语言中高频出现的隐喻表达在另一种语言中低频出现或者完全不出现。我们来对比一组例子:

- (5) a. But when he was **hot** in 1987 he wasn't like just anybody.
b. Come over later and have a cup of tea, said Lucy, each word measured, sounded **cold** and reasonable.
c. The telephone can be rather **cold**.
d. Alfredo, Hoffman's bank clerk, is **warm** and friendly.
- (6) a. 心要热,头脑要冷。(* 头脑很冷)
b. 在黑龙江省尚志市,认识李洪超的人,都知道他面冷心善,把老百姓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 他脸很冷)
c. 罩上一层层耀眼的光环,若是有一天原形毕露,就更令人齿冷。(* 牙齿感到冷或 * 齿很冷)
d. 如同呼啦圈“热”得快,“冷”得也快。(? 呼啦圈冷得快。)

这两组例句分别来自英国国家语料库和中国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均为平衡语料库,且分别是目前英语和汉语最具代表性的语料库之一。但其中温度域形容词的隐喻语言表达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英语表现出构式的一致性和围绕这一类构式而产生的主体多样性和构式具体、抽象多义性;汉语则表现出对特定构式的依赖性,尤其是单音形容词因其性质特征,呈现出谓语位置上的标记性(沈家煊 1999,李泉 2005 等都提出以单音词为主的性质形容词的无标记句法位置是定语,而出现在谓语位置多为标记性构式)。

正是鉴于隐喻研究面临的矛盾和基于使用语言观带来的启示,

以及汉英形容词字面义、隐喻义表达的差异性,本研究试图在认知语义学理论框架下对汉英物性形容词谓语句进行对比,围绕“有些隐喻为什么不可能”的问题,系统解析汉英体验域形容词抽象拓展受到的主要限制,尤其是语言规约性句法构式和形容词构形限制。

本研究的主要对象“酸-sour、甜-sweet、苦-bitter、辣-spicy/hot、冷-cold、热-hot、凉-cool、暖-warm、软-soft、硬-hard、大-big、小-small”的选择主要依据形容词类型学家 Dixon(1986,2004)和跨语言语义研究的语言学家 Wiezbicka(1986)的著作,以及 Goddard 和 Wiezbicka(2007)等相关研究来界定和选择。

Dixon 和 Aikhenvald(2004:3)指出无论一个语言的形容词类是大还是小,都必定包含尺寸(如 small, big, long, tall, short, wide, deep),新旧(如 new, young, old),价值判断(如 good, bad, lovely, perfect, proper),颜色(如 black, white, red)四类形容词,而像英语这类具有中等或大量形容词的语言,则必然同时包含如下三类形容词:

① 物理特征(physical property)——hard, soft, heavy, wet, rough, strong, clean, hot, sour 等;

② 人类特性、态度(human propensity)——jealous, happy, kind, clever, generous, cruel, proud 等;

③ 速度(speed)——fast, quick, slow 等。

汉语属于后者,即是具有中等或大量形容词类的语言,因此物理特征形容词(简称物性形容词)是其必然包含的种类,和英语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Goddard 和 Wierzbicka(2007)也指出所有语言都包含三种概念元素,即种类(KINDS)、部分(PARTS)和性质(QUALITIES)。语言使用者通常都会赋予事物一定的性质特征,或临时性的,或恒久性的。通常表达这些性质的词都是以反义、成对的方式出现,例如英语的 hot 和 cold, hard 和 soft 等。他们在利用 NSM(自然语义元语言)分析法对英语、波兰语等语言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提出了物理性质(physical quality)的概念(包括 hot, cold, warm, hard, soft; sweet, sour, salty; rough, smooth; heavy, light 等),并认为“赋予个体和类属事物特征是所有语言的共性”(同上:766)。

另外,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意义就是概念化”(Langacker 1987 等),强调人类的涉身体验在认识世界和语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解释语言表达的概念理据性的过程中,认知语言学的涉身体验观使人类的基本体验如空间、时间、情感、温度等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原因在于这些体验在人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被动使用隐喻机制(束定芳 2000)的过程中作为概念投射的源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沈家煊(1998)指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认知心理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相通。认知语言学支持人类概念和语言的普遍性,不是基于普遍语法,而是基于人类概念和语言形成的涉身性和体验性。

鉴于以上前提,同时考虑到汉英对等的可能性和平衡性(如 cold 典型对译是“冷”,但 short 虽同为典型物性形容词,但其典型对等词包括“矮”和“短”,本研究选择的个别形容词如“酸”对等的形容词虽然也可能是 acid,但后者仅适用于医学、化学领域,与味觉体验无关,而且语料库中所占比例很小,另和“酸、甜、苦”共同构成味觉域的“辣”对译可能是 hot 或 spicy,hot 所占比例很少,本研究均一一统计),本研究选取了 12 组汉英典型物性形容词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味觉域——“酸-sour、甜-sweet、苦-bitter、辣-spicy/hot”,温度域——“冷-cold、热-hot、凉-cool、暖-warm”,触觉域——“软-soft、硬-hard”,和视觉域——“大-big、小-small”。

形容词在短语或句子里的位置是其语义表现的一个线索,英语形容词的典型位置包括唯定(attributive-only),唯谓(predicative-only)和既可作定语又可作谓语的典型形容词(attributive-and-predicative)(Quirk et al. 1985)。本研究选择的形容词即属于第三种——既可以作定语也可以作谓语。

形容词的语义和性质特征往往会通过其句法位置得到体现。例如 Wierzbicka(1986)认为当英语形容词描写的是一种恒久的性质时以充当定语为常,因为定语的典型语义特征是固定性和静止性(不变性);形容词如果是描写一种临时的状态以充当谓语为常,因为谓语的典型语义特性是临时性和运动性(变化性)。例如:

(7) a. Her **red cheeks** radiated youth and good health.

b. Her cheeks **were red**.

Quirk 等(1985)还区分了内在和非内在形容词,其中内在形容词直接表述所指事物本身的固有特征(characterize the reference directly),对比:

(8) a. that **old** man (cf. That man is **old**.)

b. my **old** friend (cf. My friend is **old**.)

在例(8)a中,old在定语位置和谓语位置均可与名词man同现,意义保持不变。但在(8)b中,old从定语位置转移到谓语位置与名词friend同现时,其意义却发生了变化。形容词内在和非内在的差别在它们作谓词的时候表现明显,内在形容词在定语和谓语位置的意思一致,而非内在形容词在定语和谓语位置上意义相异。

沈家煊(1999:288)指出“汉语语法里的形容词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形容词的地位和范围,二是形容词的句法功能。”朱德熙(1956)主要依据词的外部形式将形容词分为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两类,后来(1982)又将上述形容词的形式分类进一步明确为是性质形容词(即简单形式)和状态形容词(即复杂形式)。张国宪(2006)分析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将形容词分为性质、状态和变化三类,并指出〈性质〉在定语位、〈状态〉在状语/谓语位、〈变化〉在谓语/补语位分别形成最佳匹配。如下一组简例即反映了汉语中定语和谓语位置形容词用法的相关差异,比较:

(9) a. 他这个人很酸,动辄“之乎者也”的。

* b. 他是个酸人,动辄“之乎者也”的。

这组例子中,“酸”表酸腐之义在定语位置的可接受度就低于谓语位置的可接受度。

作谓语是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之一,根据莫彭龄、单青(1985)的统计,形容词作谓语和作定语的出现率分别为27%和42%。Thompson(1988)调查了英语和汉语的形容词在口语对话中的分布,结果发现两种语言的情形大致相同,形容词作定语的出现率为32%,其余68%都是作谓语的,也就是说形容词作谓语和作定语的比例为2比1,跟莫、单的结果正好相反。胡明扬(1995)又单独进行了一次统计,结果是口语中形容词作定语为27.9%,作谓语为53.4%。

赵元任(1968)、Li 和 Thompson(1981)、朱德熙(1982)等人从句法功能出发来衡量词性,把形容词看作广义动词(或称谓词)的一个次类,或称之为“形容词性的动词”,因为他们也都认为汉语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充当谓语。

基于如上提到的形容词性质差异及其对谓语和定语位置用法的影响,更鉴于对形容词意义和形式的互动性假设,本书将研究对象界定在十二组汉英物性形容词在谓语句中的语义表现。本研究将首先通过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和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语料穷尽性检索,以北大汉英平行语料库和香港平行语料库为参照,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所检索到的目标形容词谓语句从四个方面进行对比:谓语句体验域主体分布、谓语句抽象域主体分布、谓语句构式和形容词构形。

第三节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与语料库方法的选择

认知语法观反对语言生成的自主性,认为语言结构的抽象程度受到其固化程度的影响。语言结构的每一次使用对其固化进程都有积极的影响,反复使用将加速新结构的固化,使它成为固定被接受的语言单位(reach the unit status)。可见,在不同抽象程度的语法形成过程中,语言使用的频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只有研究具体的语言使用,才能说是基于使用的语言学研究。”(Geeraerts 2007)

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假设之一为“语言知识源于语言使用”(Croft & Cruse 2004),因此基于用途(usage-based)的语言观在认知语言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一假设认为语言知识是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形成的,语言使用影响着语言范畴的表征和处理。顺应这一假设,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可利用自然语篇中的真实(authentic)语料来进行语言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语料库研究法”。语料库研究法与认知语言学在理念上具有一致性:认知语言学认为频率(frequency)在语法、语义和语篇模式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频率正是语料库为我们提供的最主要的信息。然而,长期以来认知语言学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内省法等定性研究法,语料库研究法并未